

# 我有回忆

## 目 录

前 言	1-2
(一) PAP 成立前小记	3-4
(二) PAP 的成立、发展和矛盾	4-7
(三) 林有福上台 大镇压开始	7-10
(四) 左派和极左派之别	12-19
(五) “加隆”集会的真相	19-26
(六) 另记武吉知吗小插曲	26-28
(七) 第四届中委选取举一分为二	28-34
(八) 57年八·二二大逮捕前后	34-35
(九) 第一任民选市长王永元	35-37
(十) 狱中的期待	37-39
(十一) 易润堂、陈翠嫦、陈维忠到中国	39-43
(十二) 蒂凡那代表团访问中国	43-47
(十三) 后 记	47-50

# 我有回忆

为什么会用“我有回忆”这篇不成书的文章？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在同样的时代背景，同样的历史经历，同样的社会活动，同样的奋斗理想和共同的政治目标作为我们前进的动力。但，也有不同的遭遇，不同的感受和体会，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因此，对这段存在的历史事实，有用回忆录和各种各样的流畅文笔把它描写成五颜六色、神奇妙绝的动人故事。我是一个不善文笔，少沾墨汁的普通一员，用自己的感受、体会、观点和思想对于同时代的历史故事中所留下的真空和虚传作一些补充和真实评正，对于那些被讹传所误导而犯错的思想、观点予以必要的分析，对于那些存有政治偏见和站在对立面的某些人是不值得予以评述。作为“我有回忆”也就是包含着所有这些“不同之处”。不“自以为是”地认为所有来自回忆和其它报导文章都是不正确的虚构或是片言只语。最重要的是资料的准确性是否来自亲临其境者，还是人说我说，道听途说，或是眼见不清，耳听不明，或是人传我传，无中讹传。总而言之，忠于事实，忠于历史，忠于人民和国家，那就是问心无愧了。

“我有回忆”是补充某些部份非常短暂的“历史真空”。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作为昙花一现的“政治领袖”的 PAP 副主席是和自己的资历不相称的。客观的说，人民的拥护，党员的支持，使你不得不随风而上，因此飘然而落，也不足为怪了。但令人一生的最大收获，就是留下一副值得回味的美丽彩画，作为“我有回忆”的深刻铭记。

阅读文灵兄赠送给我的大作《田流回忆录》，就 PAP 五十年代的青年充满激情投入反殖斗争行列的许多事实，涉及到党内政见分歧所产生的矛盾而导致“激进派夺权”的讹传，对 PAP 五十年代史实中所造成的混乱和不真实局面，留下了严重的空白。让我们这一代亲身经历的切身感受者不能长期沉默地听到那些毫无根据的抨击和无中生有的指摘而无动于衷。我们没有任何个人的利益要求，更不会无视社会历史的巨大变化而推卸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任何责任，但我们敢问心无愧地说：我们从 PAP 成立前后到 57 年 8 月 22 日被林有福傀儡政府无理逮捕这段极为艰难的时期，我们所做的一切，完全是无私的奉献，是对得起 PAP 从反殖斗争取得完全胜利的整个历史过程。

PAP 的成立、成长、发展和不断壮大的过程中（指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七年这段时间），我们担当的角色就是沿着 PAP 建党纲领所提出的反殖反帝斗争和争取一个独立、民主、自由、和平、没有人压迫人、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前景而奋不顾身。不管中间发生了多少波涛险恶的、来自内外的冲击，我们从来都没有背离自己的立场和离开自己的岗位。

我们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追求这个理想而不发出任何怨言或对抗的情绪，任何观点上的不同和政见上的分歧乃属社会群体组织内的正常现象，不足为怪。PAP 是新加坡广大人民寄予希望的最大政党，党内不同意见和分歧此起彼伏，不管是左派内部，或是右派内部，或左中右各派系之间的矛盾，都不断在产生、调和、斗争中得到解决。又不断地重复和循环地出现，这是政党和各社会群体中的存在和发展

的必然规律。

### （一）PAP 成立前小记

一九五四年全星学生为反“服兵役”而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李光耀律师在这场学生运动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他是学生运动的辩护律师，又是后来学生会的法律顾问。他仗义执言，公开谴责英殖民政府为继续延长其在马来亚（新加坡）的统治残喘，把正在求学的青年学生送到前线去充当炮灰。李光耀的言词，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家长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表示赞同、支持和热烈响应，李光耀成为这个时期的反殖代表。

在此同一个时期，英国以“还政予民”的美丽承诺，宣布在新加坡实施“林德宪制”的政制改良，为新加坡从自治走向独立作准备。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新加坡殖民政府统治下的原有政党和政客都发出同声赞同和表示了支持的态度，但新加坡人民一些进步的有识之士，以李光耀律师在内为代表的受英文教育和受华文教育的进步人士、积极分子，其中有工农学商等，他们对“林德宪制”的欺骗性不断地揭露，并准备采取抵制的行动。正是在这时候，经常走动于李光耀律师楼和他府上的各界进步人士，及一些志同道合者不断地和李光耀律师共商成立一个能够代表全马来亚（新加坡）人民最高利益的政党，以取代殖民政府那些唯英国利益是从的庸碌无能的投机政党。经过很短时间的筹备，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广大新加坡人民所拥护的新型政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宣告成立了。唯多利亞大会堂就从这一天开始确定了人民行动党的历史地位。闪电发出的光亮，引

导着人民从反殖斗争走向胜利、走向建国、走向经济发展，不断地向适合时代的宏伟目标求进、探索和发展高科技的道路。

## (二) PAP 的成立、发展和矛盾

PAP 成立之后，面对着两大任务，一是否参加林德宪制选举，二是组织和发展自己的队伍。

关于参加“林德宪制”选举，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坚决反对，理由是抵制选举，证明不上“林德宪制”的当；另一种意见是可以参加选举，但不执政，可以派出少部份人进入议会，利用议会的有利条件，揭穿“林德宪制”的欺骗性和暴露他们的丑恶面目。两种意见，后者取得大多数同意，并决定派出四位候选人分别在不同的地区进行竞选。他们是丹絨巴葛的李光耀秘书长、花拉柏花园的蒂凡那先生、磅俄淡宾尼的吴秋泉先生、武吉的的吗的林清祥先生。选举结果，只有花拉柏的蒂凡那以极少数之差落选，其他以绝大多数选票全部中选。

选举结果，行动党是大赢家，但真正的执政者，是以标榜劳工利益的劳工陈线。他们在议会占的比数还未超过一半，但有英国在议会分享权力的重要成员和官委的议员凑数，自然成为执政党，由该党主席马绍尔组织政府，并充当林德宪制下的首席部长，内阁成员包括该党林有福、周瑞磷等。

马绍尔领导的劳工陈线政府既无人民的支持，也无领导能力，只有以英国唯命事从，自无主张，十足表现出他是英殖民主义的傀儡政府的面目。

人民从“林德安制”选举中，已看清了英国和他的傀儡政府是站

在人民的对立面，在没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向他们进行施压的话，他们是不会作出让步的。因此，马绍尔上台之后，群众要求独立的呼声响彻云霄，世界民主运动和亚非拉的民族解放斗争汹涌澎湃。在人民力量的推动下，为了保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为了缓和人民的斗争怒潮，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作出某些妥协，向英国惺惺作态地要求加快新加坡走向完全自治的步伐，在某些问题上伪装着有 PAP 色彩的角色。用以欺骗群众，提高自己。

“林德宪制”选举，冲破了一九四八年紧急法令以后英殖民政府的白色恐怖统治气氛，民主的呼声迫得英殖民政府作出某些让步，民族独立运动更是震撼着英国白金汉宫。新加坡 PAP 领导着人民一波又一波地掀起反殖斗争的高潮，为组织、发展、壮大和取得人民信任奠下坚固的基础。英殖民政府在无可招架的形势下，以沉默的姿态布下恶毒的计划。PAP 在各个选区召开了数以百次的群众大会，教育和提高了人民的民族意识及反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情绪，英殖民政府表面假装民主，背地里却在谋划和破坏 PAP 内部的团结组织，以作好他们日后镇压 PAP 的准备。

通过选举活动，PAP 得到“民主和自由”从最早成立的“四支一分部”发展到十三支部，那是经历了不少艰苦努力和付出无数代价得来的。注：所谓四支一分部：丹绒巴葛支部、裕廊支部、花拉柏支部、磅俄淡宾尼支部和武吉的鸣分部（后来改为支部）。

支部的先后成立和不断发展、壮大，使中央的领导能力受到考验。在那艰苦反殖的岁月里，各支部所开销的费用完全是由一些无产的支

持者捐献的，偶尔需要花费多一点钱，在无法可施的困境时，不得不向中央财政提出援手，但都被主理财务的王永元先生所拒绝。王永元是 PAP 主理财务的能手，但态度坚硬，待人傲慢，得不到基层组织的好感，因而造成他和基层组织之间存在不少芥蒂和矛盾，使他在党中央第四届选举中落败，导致李光耀“误会”，引发出一场对历史错误的讹传。是非曲折，真假错对，并没有人去作出认真考证，只是讹传，就写出了形形色色的各样文章，敌人、朋友、还是在一起共事的同志，很多因为不明内情，有些是别有用心，有些是为避免自己牵涉在内，就把当时历史真实的一面加以掩盖、歪曲、恶意攻击。对于这些文章，我不想作出指责，但必须说出真相，把误导性的历史劣渍作一点清洗，要为新加坡 PAP 五十年代反殖时期的历史说真话。

沉默是“明哲保身”的明智之举，说话却往往惹来不幸的祸患，所谓“祸从口出”，就是这个道理。为了真相，为了使这段历史得到纠正，我也顾不了太多了，哪怕是引起一些人的误会、不满，甚至歪曲和指责，为了历史真实的补充，那是不可能退却的。

一九五五年选举结束以后，新加坡政治舞台上出现一小片晴朗的天空，党的组织不断扩大，党的活动全面性开展，各个支部成为来自各方群众汇聚的大本营。工人、农民、学生、教师、家长、妇女、小商、小贩、街坊文艺、文化等纷纷成立和组织自己的团体，民族运动空前高涨，反殖呼声响彻云霄。要求独立，要求自由民主的群众运动热潮席卷着整个新加坡，英政府怕了，马绍尔动摇了，形势的发展有可能迫使英国提早“还政予民”。对于这个不利的局面，英国政府为

维护其在新加坡的长远利益，他伙同马绍尔而后林有福政府谋划对 PAP 进行分裂活动，他把受广大人民支持和拥护的、参予工会和民间团体活动的领导人、基层干部说成是马来亚共产党人或是受共产党利用的“极左派”，作为他分裂、打击和对付 PAP 的代名词。英国为了借用李光耀秘书长在 PAP 的领导地位和威望，极尽挑拨、分化的惯用手法，指李秘书长是被共产党利用的统战对象，指 PAP 是共产党借以进行其颠覆和推翻合法政府活动的保护伞。总之，一切不利英国统治利益的反殖斗争都被说成是马共在背后策动的，一切的不安、动乱给人民带来不幸和苦难都是马共一手造成的。他们认为如果 PAP 继续保持现状，李光耀秘书长不作出果断的决定，公开与“极左派”划清界线，迟早总会被牵连在内的。

一九五六年至下旬，新加坡人民反殖运动已从高潮走向被镇压的命运。三月间由马绍尔首席部长带领了谈判代表团赴英谈判，李光耀和林清祥议员代表 PAP 随团前往，代表团在启程赴英之前先在加冷机场召开了近五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以壮大声势来支援代表团赴英谈判的政治本钱。大会刚刚开始，就被英政府控制的政治部化装人员和别有用心份子进行破坏，大会无法进行下去，英国政府的预谋总算“得逞了”。①

### （三）林有福上台 大镇压开始

经过几轮讨价还价之后，英国看出马绍尔被人民的反殖斗争所动摇，不惜换马，坚决拒绝马绍尔提出的最低要求——全面性的“自治”，谈判宣告失败。马绍尔宣布辞职，劳工阵线的第二号人物林有福取而



代之，当起新加坡续任的首席部长。

林有福上台后，政治气氛大起变化，在殖民主子密令下，百分之百成了傀儡政府，他深得英殖民政府的信任，计划向 PAP 的群众组织下手，削弱和瓦解 PAP 的群众基础，因此，他向工会和一些进步团体开刀。约在同年六月间，他援引新通过的公安法令，逮捕了 PAP 中委谢奕田，不久又逮捕了教师会主席陈广风、教师陈益新、学生会主席孙罗文以及知识界的陈蒙鹤女士等……还对工会和人民团体施加压力、威胁、逮捕，连续不断，被激怒了的不满终于暴发了，各个工会号召组织统一行动，成立了“九五工团”向林有福政府正式宣战，要求释放被捕人士，取消公安法令，结束殖民统治，林有福政府下台……形势的发展很不利于英国统治。

“九五工团”在当时已成为抗议行动的火车头，社会上的反殖力量纷纷参与行动。英国紧张，林有福疯狂，一场大镇压的密谋正在进行中，内政部部署了全面性镇压的计划，警方和政治部的密探无处不在，不断伺机进行破坏反殖群众大会，嫁祸反殖运动，借口共产党人在幕后进行煽动、颠覆，以便一举扑灭烈火般的反殖热潮。一九五六年十月廿五日下午五时，PAP 武吉的武支部在美世界草场召开了有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李光耀秘书长和各中委都有出席，并做了讲话：指出林有福政府正在向人民发动进攻，一场流血的事件随时会发生，要求学生冷静、有理智地与当局干涉，尽快恢复上课。

大约六点半左右，天已渐黑，大会结束，人群开始疏散，正是在这个时候，一小群类似工人打扮的不明份子大声高喊，号召参加大会

的群众步行到华中支持学生的抗议行动。一时间，群情汹涌，一大批不明真相的散会群众即刻响应和附和他们的“号召”，蜂拥地加进他们的队伍，沿途回荡着激烈的口号和战斗的歌声。还有一小撮人，企图乘机破坏邻近的本地工厂，但这些阴谋没有得逞。当队伍到达华中大门口时，就遇到警方的阻挡。那些负有特别任务的“勇士们”，事实上他们是政治部乔装的密探，他们喊打喊杀，直向警方动手，为制造动乱布设陷阱，警方迅速配合，即刻调动镇压暴动队驻在华中门口大马路，一场血腥大镇压就在这里开始了。

警方开枪，射放催泪弹，驱赶人群，像野兽般地凶猛、残暴，穷追猛打那些手无寸铁的群众。有无数人受伤，有不幸者被杀，警方也有死于非命的，场面混乱，局势难以控制。大约在午夜十二点，警方宣布全星进入紧急状态，全面戒严，被驱散的群众很快又集聚起来，政治部化了装的密探和打手们深入到群众队伍中去，他们大声叫嚷：“杀死所有警方和他的走狗”。被激怒的群众，已失去了理智和清醒，跟随着这班“勇敢的煽动者”，四处奔走、烧车、烧汽油站，到底发生什么事，很多人都不知道，但集聚在弥驼路的各业工会早已被包围，PAP 林清祥议员、蒂凡那、方水双和九五工团的领袖詹密星、乌哈尔布都车哩等都被警方引用“公安法令”拘捕，各业工会和九五工团的部分工会都被查封，重要成员也多数被捕，另外一些重要的工会成员，他们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警方的全面性搜查、逮捕行动一定会持续下去，“公安法令”的白色恐怖像魔鬼似的幽灵威胁着每一个人的安全，在这段时间内，站在反殖前线的重要领导人被捕了。没有被

捕的第二线重要成员大都分散暂避，乃有少数“勇者”试图出来收拾残局，恢复和重振工会组织，也有相当部分人对反殖斗争失去信心、消极、悲观、说怪话。令人惊奇的是从白色恐怖的恶浪中，冒出了一批新脸孔，非常积极勇敢，宣告要不顾一切与英政府及林有福走狗周旋到底。勇敢归勇敢，口号归口号，当白色恐怖仍然笼罩着新加坡大地的時候，所有经过这场风暴摧残的各个反殖力量和民众组织，由于群龙无首，几于陷入瘫痪状态，明智者只能静观局势发展的变化，不作任何冲动。我们 PAP 内林清祥议员、蒂凡那、方水双等因是工会和“九五工团”的主要领导而被捕。表面上对行动党中委会和重要的基层领导并没有采取任何逮捕行动，是对行动党网开一面，是给李光耀秘书长的面子？或是放长线钓大鱼？在 PAP 各个支部寻找能钓到一条隐藏在 PAP 内的共产党大鱼。这是英国和林有福政府为他准备全面性镇压被视为 PAP 左派力量的大阴谋。他们不会放弃，为保护英国在马来亚（新加坡）的长远利益和林有福傀儡政府的统治地位，一切牺牲人民利益的手段对他们来说都是合法的，何况是对 PAP。

#### （四）大镇压后的形势

一九五六年十月廿六日经过这场大风暴以后，直到五七年这段时间，PAP 李光耀秘书长也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意识到英国政府是不会轻易通过普选让 PAP 取得执政，更不会轻而易举地让新加坡“从自治走向独立”，除非把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清理干净，包括 PAP 内的所谓“亲共份子”。李光耀是一个高智慧、机敏、成熟有远见、能随机应变的政治领袖，他看到这个对 PAP 极为不利的局面，他权衡着如

何带有妥协性的新对策去缓和同英国人的关系，他要改变他的策略，稍作改变 PAP 建党之时的纲领和口号，以适应时局变化的需要。

正是这个对策和口号，引发出一场严肃的政治争议，并发展为第四届中央选举所谓“夺权”的荒谬。历史的描写、传媒的报导、对事件的评价，不是别有用心，就是错误百出，一切不实的讹传就是从这里开始。

李光耀秘书长提出的对策和口号是：

- (一) 为新加坡的独立寻找捷径。指出新加坡没有条件单独生存，原因缺少土地，缺少发展经济的资源，粮食要靠外来，喝水要靠马来亚的柔佛洲供应。如要独立，必须走向同马来亚合并的道路，马来亚已订于一九五七年八月三十一日独立，合并后的新加坡自然成为马来亚独立的一部分，所以有先合并、后独立的提法。
- (二) PAP 已被英国和世界关注新加坡的国家视为是马来亚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是亲共的反殖统一战线，不与之坚决划清界线，PAP 有可能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为证明 PAP 与马共之不同，李光耀秘书长把行动党纲领中的社会主义目标以“非共民主社会主义”而代之，这一口号的改变，不但是在表白自己非共，而且是公开宣布与马共划清界线。“非共民主社会主义”这一提法，成为党内和社会上议论纷纭最多的议题。
- (三) 面对恶境，PAP 对新加坡即将进行的三个选举在各支部联席会议上开展讨论，三个选举：区议会选举、市议会选举、还

有立法议会选举。李光耀秘书长提出“从目前的形势看，先选举对 PAP 不利，我们的支持者大部分是从唐山到新加坡的阿伯和一些家庭妇女，他们不是公民，没有投票权，真正有投票权的是在新加坡出生的年青一代。因此，我们必须先争取公民权，然后才参加选举。”与会者大部分都不表同意，而且对先合并、后独立，以及“非共民主社会主义”的提法都表示了质疑，甚至持反对的态度。

李光耀是一个不易被动摇或被说服的主观派，面对各支部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不会也不愿意去做客观的分析和有选择的对待，将所有持不同意见的人都归咎于“共产党人”故意给他制造困难。他态度坚决，不听劝说，但他错了，PAP 从中央到支部，真正反对李光耀的并不多，他们只是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看法，从党的团结和利益出发，决不会做出任何有损反殖斗争和不利于李光耀的事。最后从误会演变为矛盾、分化以及势不两立的对抗那是另外一回事。

### （五）左派和极左派之别

事情的演变，往往是不能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PAP 李光耀提出的对策和口号催生出一批极左派的冒险份子，他们来自何方，无法查究，但来自学运的某些积极分子，很多是我们不熟悉和疏于来往的，他们的积极、热情、充满冲劲的活动能力是不能小视的。他们深入工会、重组工会、发展工会，并力图改变或破坏 PAP，公然挑拨说：PAP 已经完成它反殖斗争的历史任务，李光耀已成为英国利益代表，建议要成立一个真正能负起领导人民，完成反帝反殖、争取

民族独立的新政党，要支持马绍尔和吴光明……推出马绍尔为组织新政党领导人。奇怪的是，这位马绍尔先生大家早就知道他是一位见风使舵的投机政客，既然可以代表这批人成立一个如此“理想”的新政党，那真是叫人百思不解的。

再回过头来讲，李光耀提出的“非共、民主社会主义”、“先合并后独立”、“先登记公民权后选举”这一系列主张，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支部要员都有一个共同看法：认为表明“非共”除了说明与共产党无关之外，又有什么其它意义？“先合并，后独立”等于削弱人民反帝斗争的意志，“先登记公民权，后选举”是看不到拥有公民权的选民是和我们站在一起的。在这些词题上，支部的主要成员和李光耀秘书长是持不同意见的，所谓政见分歧，由此而起。

但 PAP 毕竟是最有组织、最有战斗性、最有群众基础和最有威信的革命政党，党内的团结远超过于不同政见的分歧，除了“非共”较为有争议性之外，其它两个问题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支部主要负责人明白，为了顾全党内团结的大局，必须要维护李光耀在 PAP 的领导权威，决不允许搞分裂、搞破坏。对于那些极左派的冒险主义分子大搞分裂活动，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不管他们来自何方，能说服的就说服，能妥协的我们可以作出一些妥协，否则，决不让步。

一九五七年三月间，李光耀随同劳工阵线林有福政府第二次赴英谈判。结果，新加坡取得“自治邦”的地位，立法议会全部议员可以由普选产生，首席部长可以改为总理，其它一切全是围绕着英国利益而订的宪法。这个“成绩”对林有福政府来说已可满足他的政治虚荣

感，但人民对他乞讨回来的“自治邦”并无雀跃欢舞，代表行动党的李光耀秘书长和新加坡所有反殖团体和个人都认为，反殖斗争任务没有完成，要继续坚持下去，争取星马统一，实现一个完全自由、民主、独立的马来亚。

在李光耀赴英谈判的这段时间，行动党内的争议愈演愈烈，不少来自学运的骨干人物，着力通过 PAP 支部的关系参加每周举行的中支联系会议，印象最深的一次中支委联系会议是在武吉班让召开，由杜进才主席主持会议。与会者很多不是支部成员，但都像支部有权威性的发言人。杜进才主席对这次会议非常不满，以不欢而散的联席会议埋下了严重误会和分裂的导火线。

李光耀从英伦回到新加坡后，情绪凝重，一方面介绍赴英“宪制谈判代表团”取得“自治邦”成果的态度，另一方面对于行动党内严重存在政见分歧感到共产党已在蠢蠢欲动，企图置行动党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并借用行动党的合法地位来掩饰共产党地下活动的阴谋。他以英国工党的理念排斥与共产党的合作，他强调非共的重要性。行动党的“非共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纲领是不容反对的。如反对非共，哪怕是政见上的分歧，也是“亲共”的表现。李光耀的强硬态度表现出他与“亲共”分子势不两立的决心，更不顾一切地放弃反殖斗争战略上的需要，把那些为顾全大局的似是“亲共”的支部要员视为和极左思想的亲共分子完全是一伙的，使大部分任劳任怨为行动党付出无数精力的老党员受到委屈和冤枉，但他们仍然站在行动党内为李光耀说话，把反殖斗争的大团结作为一个至高无比的原则来对待。

新加坡通过宪制谈判，取得“自治邦”地位之后，社会上引起了一阵纷争和议论，行动党内的大部分同志都认为“自治宪法”基本上可以接受，但必须继续争取独立，即所说的“满意而不满足”，这是占行动党内绝大多数的意见。另有一种是极其不负责任的极左派思想，他们否定一切，认为是英国用自治来削弱马来亚（新加坡）人民反殖斗争的意志，转移人民斗争的视线，要求英国撤出在新加坡的军事基地，新加坡必须争取走向完全独立的道路，不容任何政客从中作梗。他们高唱要把争取新加坡完全独立推向新的高潮。

英政府对林有福政府于一九五六年十月镇压反殖人士有功表示回报，在宪法上规定新加坡走向“完全自治”。由于马绍尔第一次赴英宪制谈判失败，辞去首席部长职位后，一直耿耿于怀，对这次林有福获得英国的“信任”，赐予“自治”成果心有不甘。他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必需改变形象。他无中生有地发表一系列抨击和挖苦李光耀代表 PAP 在宪制谈判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当时一些与行动党专搞对抗的假左派和极端冒险分子对马绍尔的言论发出共鸣和呼拥的声音。马绍尔对自己十分无知，还以为他的言论发挥作用，主动地伙同上述这般人迅速地开展活动，筹集政治资本作为东山再起的跳板。不久，一个以马绍尔、吴光明为首的新政党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马绍尔以为 PAP 的基层组织和中委部分领导必被卷进他所设的圈套，他闻到有些左派人士向其倾斜的味道，他踌躇满志，喜出常态，错估形势，迫不急待地向李光耀提出挑战，希望通过人民的测试来检验自己的能量。李光耀胸有成竹，以迅速的行动突然宣布辞去丹絨巴



葛议员席位，提出在该区举行补选，决与马绍尔一见高低。结果，马绍尔已知其势力来自“左派”的支持是非常脆弱的。相反的，行动党各支部和支持该党的广大群众是不可能动摇的政治基础。因此，马绍尔放弃成立新政党，宣布退出补选，那些极热衷搞分裂活动的一小撮人只好不告而终。

在补选中，PAP 支部的主要负责人在花拉柏支部开会，由该支部主席王才安主持，秘书戴秋声记录，中委吴文斗、陈从今和秘书都有出席会议。对于社会上出现支持马绍尔、吴光明补选和积极成立新政党的某些极左派的活动者表示极严重的关注，对他们的理论和行为作了客观的分析：不管他们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本身的行为就是分裂 PAP 中央和支部的关系，破坏人民反殖斗争的大团结，打击行动党在人民群众中长期建立起来的威信。他们以为马绍尔是一个容易驾驭的政客，利用马绍尔的“弱点”就可以掩盖他们躲在背后的冒险行动。事实上，他们的所作所为，大大地帮助了英殖民地和林有福政府的大忙，更严重的是，把行动党部分中委和各支部之间的关系染上一层浓密的色彩，在行动党内制造一场大误会。李光耀对各支部早就有看法，始终认为行动党各支部除丹绒巴葛支部外都是受共产党控制的，他把支部的主要负责人和积极参与活动的党员都视为是“亲共分子”。但行动党的群众基础主要是来自支部这些“亲共分子”的牺牲精神和高尚品德。他们不计个人得失，付出不计回报，不管形势对他们多么不利，不管受到多大的委屈和压力，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支持 PAP、拥护 PAP、把 PAP 塑造成为一个受广大人民群众非常爱戴

新型政党,是他们最坚定不移和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李光耀很清楚,也很不满意这般“亲共分子”渗透到行动党内,成为遮掩他们在幕后活动的保护伞。可是,李光耀更知道,这是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PAP要在自治宪制普选中取得执政,还需要保持 PAP 内部团结的关系,破裂就等于自毁。

社会上极左冒险分子非常活跃,他们最先成立“全星工会”,创办工人报,发表一些煽动性很强的文章,引起前各业工会老执委的不满和怀疑,经过双方不断的接触和协商,达成放弃“全星”,建立泛星工会的默契。从此,泛星成为各业工会被封之后的一颗新星,照亮着被镇压后工人在迷茫中失去方向的一条新前路。

对于泛星工会的活动情况和各业工会的火热时期,我因把全部精神贯注在行动党武吉知吗支部的组织和发展群众的工作上,完全同他们没有任何组织上和活动上的联系,但对于工会在反殖斗争中所担任的角色和影响政局的作用,是不可能与 PAP 分开的。在这方面 PAP 各支部从来不反对工会自作主张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但也不是没有原则地附和给他们给社会政局带来可能产生的不利因素。因此,和工会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

言确凿<sup>záo</sup>,李光耀一直认为 PAP 支部与工会乃是一丘之貉<sup>hé</sup>,不屑为谋,政治偏见引发出误会的扩张。为避免误会的深化,部分中委和支部主要负责人主动向工会某些对李光耀有抗拒思想的极左派进行劝说,主观愿望就是要制止他们分裂行动党和对抗李光耀。我们的善意和努力得到的是两面不讨好,但不管怎样,我们一定要把团结的

力量、统一的行动纳入反殖斗争的轨道。李光耀不理解，我们心里无愧，找那些极左分子讲道理，摆事实，细述利害关系，我们所能作的就是这些，招来的误会自己承担，决不后悔。

在武吉班浪、武吉知吗、裕廊、花拉柏、女皇镇、巴耶里峇，磅俄淡宾尼等支部积极举行反分裂主义的会议。在会上进行激烈辩论，各不妥协，几闹疆局。但历史已成过去，记忆是否仍然犹新，只有经历者也许不会忘记，可惜在 PAP 的史实中仍然是“空白”。

事成过去，就是“空白”，也是有人会去追忆。历史可能被遗忘、被误导、被歪曲、被否定，但历史的真实本质一直在闪耀着自己的光芒，任谁也无法掩盖的。

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是 PAP 第四届中委选举，重选十二名中央委员续任领导。他们最迫切的承担是迎战新加坡自治政府即将面临的三个选举——区议会选举、市议会选举和立法议会选举。

这次中央委员会选举，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和重视是必然的。首先，英殖民者，林有福政府和其它党派对 PAP 中委会选举不断进行挑拨离间，指共产党企图控制 PAP 领导权，要把“非共”的温和派踢出局，提醒李光耀、杜进才等“非共领导”要警惕共产党的阴谋，别为共产党所渗透和利用。在五六年十一月以后，有来自学界的、工会的、积极活跃分子的各路人马，分别在各个支部扮演着出谋献策的不同角色。他们的身份，有隐约露出其不可告人的“重要性”，有些是明示其身地强调自己坚定不移的观点，有的是自认要参与改变行动党领导权力的分配，更加离普的还有一些人声言，如果不改变 PAP 领导就

划清界线，另起炉灶——成立新政党等……这些人的言论出格，行为可疑。这些人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我们不能归一而论。其中不缺有野心的，有搞分裂的，搞破坏的，但大部分是善良的无知，可怕的幼稚。戴在他们头上的是“极左冒险主义分子”帽子，我们完全同意这种称呼。随后的所谓“激进派”新名称，又把“极左冒险主义分子”混淆在一起，硬将两者变成一个同义词，这点，我们是不可能苟同的。

PAP 面临着这些极左分子的分裂活动，是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李光耀和中委会非常关注，对各支部负责人不仅怀疑，而且也不信任。指责支部负责人和工会领袖都是“亲共分子”，要为他们自己的行动负责。面向着如何缓与与李光耀的关系，如何使李光耀能理解各支部与工会之间有不同的立场和争议，如何促成他对支部沟通和了解，只要揭开此中神秘面纱，一切都很清楚的。

PAP 决不允许分裂，李光耀反殖斗争的领导地位决不能被削弱，否则，以行动党为代表的反殖统一核心一定被挫伤，新加坡从自治走向独立又不知要走多少冤枉路？经过不断地分析和估计未来的形势，得出一个客观和有力的答案：①一定要说服“极左分子”。②阻止他们的分裂活动。③最后和他们摊牌或是划清界线。另一方面，一定要将情况上报中委，避免产生误会。但谁为代表，各支部并没有作出决定，但大家都认为，各支部都负有责任。

## （六）“加隆”集会的真相

五七年七月间各支部互相交换了意见，决定约见工界和学界三个代表前往裕廊离岸十几公里的鱼棚，“加隆”聚会，支部参加者有：

丹绒巴葛的陈志城、刘波德、钟文灵和他当今的太太徐绿娣女士，武吉班让的黄登元、×荣华，武吉知吗的陈贡元、（朱秀兴有事没有出席），花拉柏王才安、戴秋声、段文华，巴耶里峇陈木庭、卓中华，女皇镇邢福源、×××，还有中委吴文斗、陈从今，对方是林戴伟、吴宗德，还有不认识的×××，与会者约廿名左右，在出发前，大家一起行动，到达裕廊岸边，再乘小船到加隆，路程 40 分钟。抵达“加隆”屋棚，“渔头老工”一见我们队伍中有一位女性，徐绿娣小姐，即刻变脸，随即找我谈话，他不能允许徐小姐上渔棚，指女性上渔棚是很不吉祥的事，会坏他们捕鱼收获。这次到“加隆”集会，是我找当时裕廊支部执委渔民公会负责人陈国勤、陈秋扬（行动党裕廊支部重要成员）联系的。当时没有电话通知两位陈先生，只好费尽三寸不烂的舌头表现出非常诚恳和友好的态度，恳请通融。“渔头老工”有点不好意思，他和几位渔工商量之后，要求以烧香拜神让徐小姐上棚，当然我们完全同意，此事终于得以解决。

上了“加隆”后，海风吹拂，格外清凉，大家身处海景中间，一片汪洋，看不到我们登船的渔村小岸，宁静的小屋（渔棚）集聚着有十几廿位有着良好愿望的 PAP 支部要员和两位中委及三名将要摊牌的谈判对象。在还没有进入主题活动之前，大家先感受一下海上大自然的伟大魅力。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第一次到“加隆”的，对这里捕鱼的渔棚建筑、设计感到非常兴致，还有对那些渔网、渔具、捕鱼的技术感到十分新鲜。大家分头游览，观赏这种难得一见的“海上渔屋”的特殊美景。遥望远方，却是一片汪洋大海，前无阻挡，后无障碍，

预示着我们这次反分裂谈判一定会顺利、成功！

大家自带饮料和食品，像平时参加野餐会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得到渔工们的招待，他们把捉到的鱼鲜用各种的煮法请我们吃，我们非常感激他们的热情招待。在离开之前，我们把没吃的自带食物和饮料都留下来，但不是作为回报的礼物。

一切安排好了，二十多名在渔棚里做客的 PAP 成员和三名异见者就坐在“屋里”的木板上举行一场开诚布公的讨论会，或可说是辩论会。双方各坐一边，阵线分明，友好协商，还是针锋相对，那就要看这次会议的结果。

会议开始了，我负责主持，林戴伟第一个发言，大意是自五六年十月廿六以后，以李光耀为领导的行动党已变得软弱无能，对李光耀不能再寄予期望，他斩钉截铁地说，一定要建立一个适应反殖斗争要求的“新政党”，以取代行动党的历史使命。他语音未完，就遭到 PAP 成员的反对声音，激烈的辩论就此拉开序幕了。

PAP 的大部分成员指出：这是明显地搞分裂活动，对反殖斗争带来了的破坏是不可估计的。我们要求对方停止这种分裂行为，但对方认为这不是分裂，是反殖斗争重振力量的正义行动，是群众运动被镇压后处于低潮时来一次死而后生的尝试，是要李光耀和 PAP 内部保守派看到人民力量的强大。总之，如果不重建新政党，就要对行动党进行一次大手术，注入新血，淘汰旧疾，将李光耀等保守派在中央选举中孤立起来，让真正的反殖力量在 PAP 内占绝大多数，改变和扭转 PAP 的政治路线，朝着反殖斗争的方向发展。他们的目的是想

要夺取行动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权，彻底改变行动党的本质。面对这些口号式的“道理”，绝不是对方单纯的政治冲动，或是表现无知的糊涂。其背后有着各方无形的算计，试图对 PAP 一分钟也不能让其安然度过。不难想象，极左派冒险主义分子的冲动、幼稚、无知是最容易被利用的。

PAP 建党近三年多，一直被视为是新加坡左派运动的代表，是统治者最为担忧的对象。除了暴力镇压之外，“以左治左”是他们对付行动党最有效的手段。一般而言，政见分歧演变为思想矛盾，意见纷争进入感情冲突，矛盾提升发展为对抗情绪，这是多么可悲又可叹的结果。但归根到底，都是受到外界敌对势力的分化和破坏所造成的误会。我们不管对方是受哪方面的影响和利用，或是自以为是代表“正确力量”的化身，我们都是从大局出发，以团结为重，为他们的错误思想和行为而发出严重警告。除此之外，只要他们在 PAP 主导思想的范围内进行正常活动，不搞分裂，不搞破坏，不搞阴谋，合理的建议，有利团结、反殖的主张，我们都会认真考虑，必要时作出某些妥协。

观点明确，辩论进行了一段时间，各支部要员和两位中委基本取得一致：（一）反对他们搞分裂；（二）反对他们做出任何有损行动党的行为和活动；（三）不同意他们孤立和打击李光耀等；（四）要顾全大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五）由各支部把情况反映给党中央组织秘书王邦文。这不是决议，也不做记录，是为全党的正义融合作出一次冒险的冲杀，不管要付出多少代价，当我们的思想并没有完

全进入成熟的阶段，我们只能以最善良的愿望期待着理想变成现实，那就是我们付出的代价得到回报。

各支部和两位中委以及对方的三位代表在严重分歧的短兵相触中幸好没有发生对抗性的矛盾。对方完全没有意料到，两位中委和行动党支部的要员如此团结，如此一致，如此坚决，又如此地认真严肃。更为可怕的是这些支部要员在各区里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他们的威信足以影响“三个代表”想为但又不可为的“全盘计划”。在权衡得失关系之后，对方答应不成立新政党，但提出推荐参加 PAP 中委候选人的要求，我们是没有理由反对的。对此问题，对方的目的昭然若示，企图把 PAP 变为他们操控的机器。谁都知道，这是关系到 PAP 今后的走向，是反殖斗争能否进行到底的大原则问题，是为英国和林有福傀儡政府提供子弹向自己身体发射的危险讯号。我们决不退让，但有利于大局的我们可以妥协。为此，我们提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建议，就是在物色人选方面，不许外力参与，只能在各支部择优而任，以资格最老、工作能力强、有群众基础、为李光耀和中委会所熟知的老党员中选出。大家经过细致分析和讨论，达致共识，互不让步的激辩和争论暂告一段落。

共识不等于是一帆风顺，喜悦也不一定是预示成功的开始，说过的话并不等于承诺，许下的默契随时可以付诸东流，一切的一切，只有成为事实之后才能作出肯定。

我们的共识并没有附带任何条件，唯一的目的是把我们和李光耀的误会减到最低，不要再掀起任何怀疑的气氛。在这次第四届中央选



举中，他们在表面上似有退让的迹象，将原来拟定好的计划作出修改，既不能以成立新政党代替行动党而决定暂停筹建新政党的考虑，但从今而后，PAP 必须由“信得过的自己人”在党内占多数，把那些只挂名而又不办事的中委换走，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新中央委员会而以操纵行动党的命运。

第三届行动党中央委员共有 14 名，林清祥、谢奕田、蒂凡那被捕之后，陈从今、吴文斗和一名马来人伊士迈拉钦补上，剩下的十一名中委，他们是李光耀、杜进才、王永元、潘铁人、陈维忠、吴秋泉、TT 拉惹、哈伦卡森、阿末伊不拉钦、陈从今、吴文斗。在这十一名中委名单里，他们只同意保留杜进才、李光耀，另外三名认为是可靠的“自己人”：TT 拉惹、吴文斗和陈从今，其它空缺，由各支部或工会合力促成，但必须有把握是“自己人”。

被誉为“自己人”，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所谓志不同，不相为谋。对于极左思想的冒险主义者，我们是不屑一顾的。我们的信念：维护 PAP 全党一致，团结为重，反殖统一，粉碎分裂，继续支持以李光耀为领导的 PAP 不要发生任何动荡。大家同心同德，求同存异，为反殖的胜利、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站稳自己的岗位，坚持自己的立场，其它什么都不用说了……

安排 PAP 第四届选出新的委员，是一个关键的考虑。不得否认，各方都在积极准备“自己人”，李光耀决不允许“自己人”被抛出中央门外，唯独我们不把“自己人”看得怎么简单，我们知道这里的“自己人”有着非常复杂的背景，真正能左右大局的还是保持行动党一贯

的风格，以不同的“自己人”变为求同存异的合作者，朝着共同的目标去寻找一个圆满的答案。

在讨论推出人选方面，一开始，他们就不避嫌地要求各支部派出两人或由他们举荐的工会代表参选。他们的建议，遭到我们的反对，我们认为，这次中委选举，不宜太多候选人参选，工会代表最好不宜介入，支部只能推出与中央较有密切的、能起沟通关系的个别成员为候选人，能否中选事小，动摇和削弱党的威信事大。本着这一良好的愿望，我们同意保留原中委 TT 拉惹、陈从今、吴文斗的中央席位，另选出武吉知吗支部主席陈贡元、花拉柏支部主席王才安，还有由武吉的知筹建支部的老功臣陈世鑑等作为第四届中委的候选人。推出上述三位人选，都是 PAP 同期建党时的党员和最早筹建支部的负责人，早已同中央建立关系，与李光耀、杜进才、王永元、王邦组织秘书等较有接触，为他们所熟悉的老党员，作为和中央沟通，缓和李光耀等和各支部的误会、以及与工会愈演愈烈的矛盾也许是最好的人选，除此之外，并无其它良策。

在三位人选中，我和陈世鑑早就在野餐会上认识，王才安是花拉柏支部筹建人，从蒂凡那参加该区立法会议选举，我们就互相认识，并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关系。这次被推选出来，主要是 PAP 建党前前后后，我们都是参与活动和积极推动基层组织的最早党员之一，得到各支部的认同。

加隆会议决不是什么秘密会议，它是公开的、坦然的、无私的，有人把它神化为共产党的地下会议，是一次有组织、有阴谋的夺权活

动。这是错误的、是虚构的、是别有用心的。有颜参与该次会议的老朋友，大有人在。但以明哲保身的聪慧避而谈之，免受其祸，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些不明情况的人，除了道听途说之外，也自以为是的信口开河，胡说什么，“他们搞的那一套（指加隆会议），我们是不赞成的。”对于他们说的话，我们只能一笑置之。也可以看到他们长期离开社会的现实生活，说话不经思考，太缺深度了。

### （七）另记武吉知吗小插曲

为留后记，这里顺便参插一小段武吉知吗筹建支部的小记。

说来难过，筹建武吉的知吗支部的主要负责人陈岳英、郑清江、谢奕田、陈延生都先后辞世，尚存的只有陈贡元、陈世鑑，参与积极推动者有叶绍柏、贝道南、陈福生、陈英杰、陈文蛟，还有树群校友会部分执委等，朱秀兴是我的好朋友，他是支部秘书谢奕田介绍来接替工作的，谢于 55 年 8 月调上中央填补另一位中委的空缺。

秀兴兄接替了支部秘书的职位，工作积极、认真负责、为人仗义、乐于助人。我们武吉知吗区有一位工会老前辈许南星先生，因家庭负担重，生活陷入困境，周围的朋友多无能为力帮助他，秀兴兄当时在一间沙厂当文职人员，月薪一百多元，竟然拿出其工资的三分之一，作为暗中帮助许南星先生，为时不短。这件事，秀兴兄从无提起，大概只有我一人个知道，因为许南星是我的老邻居。但无论如何，我们可看到秀兴兄的为人，他是一个具有善心和厚道的好人。

支部成立之初，武吉的知吗区正好面对着立法议会的选举，PAP 推出林清祥为该区候选人。于是，支部的主要工作都放在竞选活动方

面，林清祥的激烈演说，煽情的鼓动，唤醒了多少苦难人民的情感，社会上对林清祥在竞选议员的活动中所表现出与民共患、为民牺牲、反殖不屈的顽强精神所感动，为他的政治道德和人品抱着深厚的感情和崇敬的心理，把一切美好的希望都寄托在林清祥——新加坡人的英雄偶像身上。

武吉的知支部为有这样的候选人感到很骄傲，谁都愿意为这次竞选献出一份力量。林清祥一呼万应，群众运动热火朝天，每到一处，场面轰轰烈烈，胜似喜庆过节。一场反殖斗争震天动地的怒吼，岂不引起当权者的注意，和别有用心者的污蔑——指武吉的知(包括裕廊区)区是共产党最活跃的“红色区域”，是直指武吉知知支部为共产党借以掩饰身份的“保护所”，使支部成为各方关注的重点。

林清祥以压倒性取得立会选举的胜利，为 PAP 三个议员之一，也是最年青的一位。他的议员身份在当时并不是为该区的福利和人民的生活做事，而是为着反殖斗争而献出了全部的生命精力。PAP 有这样一位勇敢的反殖斗士，李光耀能有这样的一位忠实和无私的战友，乃天颜凑合之最佳拍档。殖民统治者的权力本能，就是最担心不同政见的统一组合，在这方面，PAP 不断遭到来自各方的挑拨、唆使、离间、诽谤、造谣……使反殖斗争队伍一直处在被困扰中，甚至在“自己人”圈子里面，有误会、有阴谋、有对抗，令人感到无限的痛心、绝望，唯有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才会立于不倒之地。

武吉的知支部有幸出了四名中委和三位议员，四个中委是林清祥、谢奕田、陈世鑑、陈贡元。三位议员是林清祥、方韵琴(在武吉

知吗支部活动)、曹煜英。说起曹先生，原名曹素云，木工出身，家贫清苦，自小读书不多，后得武吉的呜树群小学校友会朋友的帮助，在武吉的呜支部成立不到一年，得“自己人”介绍，到支部参加活动。因为他擅长木工手艺，和积极党员一起修补破旧之屋，并操起他的看家本领，领着大家十分应急地做了支部所需用的简陋木具，如宣传组培训党员需用的黑木板、壁报、坐椅、枱桌等，为支部活动节省了不少经费，有功劳，但胆小怕事，一场镇压，缩在家里，经我等再三鼓励，才勉为其难地“微作出巡”。

毫不客气地说：我们武吉的呜支部从最艰难的时期出了一个受尽万人敬仰的英雄人物——林清祥议员，在进入建国阶段的新历史时期又出现了一个唐代张士贵式的高官。我们从建党开始就经受着无数苦难岁月的折磨，历历在目的万般变化，我们为新加坡人能享受着今日的幸福生活而感到高兴有馀，但也控制不住内心对那些遭遇不幸的反殖战士流下伤心泪！

武吉的呜支部的小史，如上帝还能赐我长寿的话，我再不自量力地写一段小记，不怕出丑，只为事关武吉的呜支部是有很多值得回味的，这里就告一段落。

## （八）第四届中委选举一分为二

我们作为 PAP 中委会新的候选人，并没有把握一定会中选，也没有意料到这次中委会选举会出现如此复杂和混乱的场面。照常理，PAP 第四届党员大会规定在羽毛球体育馆召开之前的半个月，中央秘书处发给各支部的党员入场票必然会收到，但我们武吉的呜支部一

直到大会召之日，仍没有接到一张入场票，连我作为此次大会的中委候选人，也不见有入场票的踪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莫明其妙，我想不通到底有谁在背后作祟：复杂的内奸？恐怖的阴谋？故意制造互不信任的怀疑？种种点滴的迹象，表明这是一场严重的政治较量。开始，我还天真地以为，我是中委候选人，有票无票不关事，也许我是不需要入门票。后来，支部一些人找到我，告诉我他们没有收到大会入门票，问我怎么办？我才开始惊觉，到底谁在背后搞鬼？

我在会场门外，看到不少我认识的支部执委，他们的情况和我一样，徘徊在会场外，都说没有接到入场证。此时，我看到李光耀秘书长和主席杜进才正朝我的方向走来，我即刻往前和他们握手并告知没票进场，李即刻叫我跟他一起进去，这时候，我才真真正正地进入会场找一席位坐下，看到周围并没坐满人，但基本上场面还是热轰轰的。再往主席台上一看，台上坐着的李光耀、杜进才、王永元和第三届所有原中委。随后，杜进才主席主持大会，宣布第四届全党大会开始，并宣读参选四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参选者一听呼名就直上主席台的一边站立着。当读完之后，我已经感到形势不对，参加中委竞选的竟然有 20 几到 30 人，是向 PAP 公开宣战，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对付 PAP 的阴谋，结果如何，心里有数。但我并不希望自己在这次的参选中获胜，我希望自己能置身于外。

非常明显，“加隆”野餐式的聚会，虽涉及商议中委选举安排，达成一致维护 PAP 内部团结的妥协和共识，推选出来的三位候选人并不为代表极左份子所信任，那只是表面的敷衍和缓和“自己人”之

权宜之计。事实证明，在这段时间内，他们已积极进行另一手，四处寻找和物色另一批“自己人”作为代替这些有值得怀疑的“自己人”。大会出现如此众多的新候选人面孔，我们根本不认识，从今、文斗、才安、世鑑和我过后一提起此事，都感到内有蹊跷，值得深思。但李光耀、杜进才混淆了我们和他们之间的不同关系，把我们当作“夺权派”。

第四届中央委员会选举的结果，王才安、陈世鑑和我都中选了，王永元、潘铁人和哈伦卡森却被除名，另一位中选新中委是陈翠嫦，在 PAP 十二名中委中，第二天就被本地各传媒和国际上各大报社以激进派和温和派划分为两阵营，行动党面临着一场分裂的严重危机。我们不明自己被划入激进派的原因，但我们深刻地明白：一场暴风雨式的残酷镇压随时都会发生在那些反殖先锋的身上，被已划分为两个阵营界线的鸿沟有什么办法可以获得弥补呢？无论怎么样，这是我们所面对的巨大压力和必须完成的重大任务。

第四届中委会第一次会议尚未召开之前，也就是新中委选出之后，新加坡各报记者到处找我们采访，我们拒绝发表任何意见，也尽量避而不见记者的采访，为的是不给外界制造行动党内部分裂的瞎想，我们不认为有强大组织，有广大群众基础，成立至今的 PAP 上下团结一致的反殖共识的良好关系，会被一般各怀鬼胎的外界渲染就会天下大乱！PAP 内部存在政见上的分歧早就已发生，但不影响整个反殖的大方向，这次出现的局面，也许是一场误会，只要我们努力劝服、解释、以十分诚恳的真诚对全党中央的决策义无反顾地作出奉

献，一切误会都将化解于无形之中。因此，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和各中委进行沟通，向各支部宣传种种有利于党内团结的活动。除此之外，还向个别有影响的、温和的工运领袖、市政工会主席黄国光先生（前国防次长黄循文的父亲）联络。黄国光长期以来和 PAP 各方面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有他从中周旋，误会可能减少。结果，良好愿望变成徒劳无功。

第四届中委会议在丹绒巴葛总部召开，全体中委尽有出席。会议一开始，李光耀秘书长即席提出不担任该届秘书长职位，接着杜进才主席也提出同样的意见，并建议由 TT 拉惹律师和两位原中委陈从今、吴文斗以及新选出来的三位中委陈世鑑、王才安和我担任新的常务委员。这突如其来的而且令人震惊的“大行动”，我们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有尽力推辞接受，劝说李光耀、杜进才等继续担任原来中常委的职务，缓和 PAP 内部突然发生的紧张关系，只要李光耀同意继续担任 PAP 秘书长这个职位，我们愿意接受他提出的条件。但李光耀态度坚决，不作任何考虑，有意或无意地把 PAP 划分成两个界线分明的派别，于无形之中给人们的感觉：李光耀是出卖左派的“祸首”，或说李光耀为林有福政权打开了清理门户的障碍。事实上：①李光耀是为失去一位极有能力的亲密助手王永元先生而有自危之感，因此大发雷霆，作出无理智的摊牌；②社会上的极左冒险主义力量已失去统一的控制，离心者所表现出来的对立是李光耀所不能容忍的；③英殖民者和林有福政权视以工会为代表的左派势力，经过 56 年 10 月镇压之后，并没有被削弱，反而转向 PAP 内部更积极的活动。为



防止共产党的颠覆活动，利用以代表非共民主力量的李光耀等作为带罪的先锋，英殖民者和林有福政权早就密谋，利用有利的时机对全社会的左派势力来一个突击，把他们一网打尽。对此，李光耀看得比谁都清楚，不和“亲共的邀进派”划分界线，迟早总会逃脱不了被共产党利用的“罪名”。也许会一举遭殃，不如早作断定，“春花秋水两分明，要为冬夏见寒暖”，这就是李光耀当时坚决果断的决定，也看出他内心充满着种种不可言喻的矛盾。

不久第二次中委会续第一次会议议程进行讨论，地点仍在丹绒巴葛支部，主题依然是围绕着中委会选出常委的事宜。我们的诚恳，李光耀似有所动容，他说出拒绝当任秘书长的原因，主要是他失去一个有力的右手，他不可能把王永元再请到中委来。说到这里，我即行表示，我愿意退出中委，名额由王永元补上，但李光耀反对，认为这是PAP全党大会的决定，要尊重民主精神，中央委员会不能随意改变，否则不合程序。经过了长时间的讨论，由于李光耀的坚持而不能达成妥协，最后，终由会议选出：

主席：陈从今      副主席：陈贡元      秘书长：TT 拉惹

副秘书长：陈世鑑      财政：王才安      副财政：吴文斗

李光耀、杜进才、吴秋泉、陈维忠、陈翠嫦、阿末伊不拉钦任中央委员。

一场党内有争议性的中委选举商议终告落幕了，但我们已有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的预感，我们即行向中委会提出尽快完成两项任务：

（一）做好各支部的团结工作，在未设支部的其它地区筹备和发展更

多支部，以应付面对即将举行的三个选举（注：区议会、市议会、立法议会选举）；（二）我们要做好消除李光耀和我们之间的深刻误会，把反殖斗争更推上前进。李光耀点头默认并作了简短发言，指望我们把工作做好，但一再强调，他不愿成为共产党人的保护伞。

我们必须严正声明，我们从行动党成立到当任中委一职，从来就不是什么共产党，共产党也不会告诉我们，在我们的队伍有哪些是共产党员，他们有什么特征，谁也不知道。他们怎能领导我们？我们又怎能接受他们的领导？充其量我们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也许有相似之处，但那是我们的出身背景和生活环境在于广大的贫苦大众，共同的生存和要求，不期然地吻合在一起，走在一起，朝着一个共同的目的而共同反殖，自然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

这股力量，不单是共产党人可以做到，PAP 反殖的胜利和建国的经济发展不就是证明了这个事实吗？因此，把一切展示势力的人民运动当成是共产党在背后指使的颠覆阴谋，这对人民是一种错误的判断，更严重的是直接或间接地为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加进了不少提高威信催化剂，此为有失周详考虑。

确实，共产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形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之后，已成为与国际资本主义阵营势均力敌的抗衡力量。“社会主义阵营”为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民族和被压迫被剥削人民寄予解放的希望之星。共产党威性像海潮一样，一浪比一浪高，以自己当时的年龄、知识和经验来说，没有理由不对他们产生崇敬的心理，也愿意为他们的理想作为自己追求的

目标。PAP 成立的纲领，虽有异于共产党，但基本目标是一致的——结束殖民地统治，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独立的，没有人压迫人、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多么吸引人的“宣言”，我虽不能用高深的理论作分析，但我以朴素的感情自愿地去为这个目标作出奉献，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亲共分子”。

在当任 PAP 中常委的二十几天，我们虽作了一些工作，但不值一提，最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没有作出任何损害党内的团结和利益。反之，我们全力以赴地推动各支部的发展，避开一切传媒的追踪采访，主动和自觉地阻止了误会的深化。我们不是怕见记者，只是不想给他们有机可乘，利用我们的讲话，散播不实之词，制造误会，引起矛盾，使 PAP 全党陷入永无休止的分裂状态。

### （九）57 年八·二二大逮捕前后

我们的党是团结的，但社会上的极左冒险力量还继续先前的活动，工会内部的情况我们不了解，也不参予工会的工作，但我们从传媒的报导中看到，以泛星工会为主力的左翼进步力量正和林有福政府控制下职工总会进行商讨工会组合和统一的问题。看来双方在某些问题上似乎有达成妥协的转机，但林有福政府决不会让自己扶植的“职总”转向左翼的队伍，他把早已准备好的一场大镇压作了周密的布署，由内政部 CID 人马于八月二十二日中午采取全面性大逮捕行动，并于第二天发表所谓“有关共产党颠覆活动”的白皮书：指共产党人已操纵了 PAP 内部最高的领导权，颠覆活动已到了无法控制的极度危险期，“政府”一定要采取坚决有效的行动，制止共产党全面性的渗

透（大意如此）……

大逮捕和白皮书的发表，完全证实了上面所说的：英殖民统治者和林有福政权早已安排好了这场大镇压的行动。

镇压行动是林有福政权企图削弱 PAP 内部被认为是“亲共势力”的影响，同时也是把一向在他们控制下的职工总会有可能落入左派工会的“统战”手中抢过来，为他们的统治保留一点小小的“群众基础”。更重要的是：为新宪制第一届市议会选举和“自治政府”立法议会选举扫清障碍。林有福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相反的，无论是市议会选举，还是立法议会选举，林有福是彻底失败的。

### （十）第一任民选市长王永元

大逮捕行动牵涉到 PAP 五名中委以及新加坡左翼工会的主要负责人和各支部的主要成员，林有福政权万万想不到，他的这一招，更激起新加坡人民更大的不满和反抗。PAP 重振队伍，秘书长 TT 拉惹辞职，中央委员会作了一些改变，李光耀重任秘书长，并作为被捕中委的代表律师。党内的关系，一切正常，全体党员更加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把反殖斗争的目标集中在议会选举方面。在这之前，为争取市议会选举的胜利，PAP 小试牛刀，派出王永元等参选，结果一面倒，王永元从平地走上了市议会的第一个台阶，这是 PAP 向权力机构冲杀所向披靡的告捷讯号。全星加坡人民振奋欢呼，即将来临的立法议会争夺“自治政府”的执政权已作为 PAP 宪制斗争的必胜手段。因此，市议会选举的结果，预示了古人所说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的真义。

王永元作为新加坡市议会第一届市长，他吸收了在 PAP 被党员误弃的经验教训，非常清楚民心的重要性。他以比共产党更左的姿态向英殖民者宣示，把象征英殖民地统治者至高无上的权杖，从市议会的大堂搬走，再不需要看英殖民者的眼色做事了。王永元的勇气和胆魄是 PAP 赋予他的权力，还是他自己思想使然，任谁也弄不清楚。但必须予以肯定，他能担任这样的角色，确实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PAP 全体党员和广大新加坡人民给予疯狂的欢呼、全力的支持和拥护、高度的评价和赞赏，是自发性和自觉性的内心反应。王永元的威信在一夜之间冲上云霄，从而；在他身上隐伏着一股超越常人的傲气。（以后自立门户创立人民统一党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对于王永元本人，我对他并没有任何个人的意见，只是在他执行党的财务工作和对支部活动的干预方面觉得有些过分，也许是一种误会。但市议会选举取得胜利后的新景象、新作风、新表现改变了我对王永元某些看法，在反殖斗争的重要时刻，在八月廿二日镇压左派力量的白色恐怖气氛中，确实需要有这样突出的人物，有勇气，有胆魄地去打碎一切旧的、邪恶的统治桎梏<sup>zhù gù</sup>，建立起把人民从苦难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英雄形象。

我们这批八·二二被捕的 PAP 中委和各支部的重要成员、工会负责人、学生和报界的名人等，从市议会选举中，都看到未来的希望，我们相信 PAP 在来年的立法议会竞选中，再不会有什么对手。林有福的劳工阵线已臭名昭著，马绍尔的名声在政治上有如病夫，一蹶不振，其它一些不足微道的机会主义政党，如民主党、自由社会党、马

华工会、巫统、劳工党、人民党等，他们只能作为陪衬的花瓶，还有什么作为？PAP 胜券在握，迈开大步，走向尊严的立法议会大堂已是明灯亮照，除了英殖民主义者的残余势力仍在操纵其岌岌可危的生命之外，一切发号施令的，不涉及英国利益的内务权力已明显地在 PAP 的掌握之中了。

### （十一）狱中的期待

我们作为被捕被拘留的 PAP 中委、各支部成员、工会负责人和社会的进步人士，在狱中期盼着 PAP 执政这一天的到来，我们将踏出铁狱的牢门，走进自由的社会，为行动党在建国艰难时期重新掀起反殖，彻底争取完全独立，为新加坡建设的伟大旗帜开放出鲜明和正义的结果，把建党提出的纲领和英勇不屈的团结战斗力量贯彻下去，在这样的精神鼓舞下，“坐牢算什么”？我们充满豪情的乐观主义的振奋心里，似乎已经投进 PAP 新的战斗行列。

狱中的生活，那只能作另外的特写，这里暂不提及。为我们所看到的、想到的、关心的是牢狱以外的事，我们这些被拘留的反殖人士，在狱中也不得不有所反思，我们对于那些激进的口号和行动，利弊所造成的局面一目了然，“实践是检验正确与否的客观标准。” PAP 在市议会的胜利，标志着反殖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高潮，也预示着殖民主义已走向崩溃的末日。但政治的走向是否还有反覆？更非所能意料。只有透视以往所走的道路和总结过去的经验，补其不足，力助其长，改变自己，走新的战略路线，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最广泛的反殖阵线范围内，在非不得已的被迫之下，决不轻易和合作者分

手，决不做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分裂行动。观点不同，思想有别，意见不合，政见分歧，但在共同的大目标下，可以求同存异，完成阶段性的伟大胜利，通过反思，大部分人都有这方面的认识。

监狱是一个大熔炉，它锻炼了人的坚强意志，燃烧着人的反思能量，提高了人的思想、认识和进步，PAP 执政的时机快要到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怀着不同的情感、思想，为自己的未来作好安排。但作为 PAP 的重要成员和一些坚定不移的反殖人士，他们翘首以待地准备继续投进 PAP 的队伍，重新挑起反殖建国的伟大旗帜，为一个即将出现的崭新社会奋勇而战。

新宪制下的内部自治立法议会选举之前，李光耀毫不含糊地向全世界宣告：PAP 若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而执政，首先一定要把和 PAP 中央有密切关系的成员释放出来，并对旧的“公安法令”作出检讨，否则行动党不会接受执政。李光耀的公开承诺说明他并没有忘记那些与他有政见分歧的 PAP 重要成员。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我们一批非新加坡出生的被拘留者，被当时的林有福政府引用驱逐法令在全部武装的强压之下，离开了自己为之奋斗而作出牺牲的可爱的新加坡国，从此流落他乡，过着另一种充满奇妙而又有价值意义的生活。同时，也真正结束了在新加坡政治舞台上扮演的任何角色，我们只能通过友邦的遥望台观注着自己国家每一分钟的变化。

一九五九年四月份，PAP 终于取得新加坡自治政府立法议会的执政权，李光耀即行下令将在狱中八名行动党前中委和著名的工运领

袖释放出来，他们是：林清祥、方水双、蒂凡那、曾超卓、陈从今、陈世鑑、乌哈尔、詹密星。李光耀实现了他在选举前所宣示的诺言，无疑地也为他肯定了政治诚信的美誉。

## （十二）易润堂、陈翠嫦、陈维忠到中国

同年秋天，中国南方大地正凉的时候，我们突然闻到从新加坡送来一股浓郁的乡情气息。不知是偶然还是有意的，在狱中有患难之交的易润堂兄弟（PAP 执政的内阁部长）和党妇女部主席（立法议员）陈翠嫦同志忽然来到广州，虽没有事前通知，但很快就和我们联络上了，我们如久别重逢地在异地见到了故亲，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激情。大家见面，紧紧握手，万千豪语，也只能以互相问候的世俗关心彼此的过去和近况，以及党执政后的新形势。我们别无他想，唯一期待的是：两位来自祖国的老战友能为我们回国（新加坡）尽一份力，让我们这一批被迫离开自己土地的同志重新回到自己的国家。我们相信，PAP 也决不会忘记那些曾经为她作出贡献的被驱逐者重返家园的要求，我们似乎已在濛濛的雨雾中看到祖国向我们招手的曙光。

事实上，在那个时候，星、中两国既没有任何外交关系，也没有民间社团来往，更谈不上有经济、文化、科学和其它领域的接触，新加坡华藉人士若要来中国探亲或旅游，也要受到一定年龄的限制。易润堂和陈翠嫦两位同志在 PAP 执政不久后就来到中国广州，令人猜测的是新加坡有意打开和中国外来接触的大门，其实不然，易润堂话闸一开，就流露出对我们的暗示，说出“我、文斗、才安是有条件回新加坡的”，言之“条件”这里有双重解释：一、我们是和 PAP “有



密切关系的条件”；二、PAP是有“条件”让我们回去的。易润堂的话是代表了李光耀总理的意思，我们也明白这个“条件”的内容，就是PAP在立会获得大胜的前夕释放被捕的八位领袖的出狱书面声明：一、支持和拥护PAP的“非共民主社会主义纲领”；二、反对共产党鼓吹的暴力革命；三、必须把上两点内容在报章和电视台公开宣谈。除此之外，易润堂也透露了PAP对我们返国之后的另两点要求：①必须留在PAP内任职；②按规定的日期前往内政部报导。条件如此，有何可言？我们既想回国，但身处异境，感受不同，尊严和人格是我们生命的空气，我们既要对得起PAP的召唤，但也要为我们的原则立场考虑。不同的年代就不可能有逾越思想的界线。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赞赏李光耀秘书长并没有遗忘他竞选前的承诺——“释放那些与行动党有密切关系的成员”。

易润堂兄弟也是在一九五七年八月廿二日大镇压中被捕入狱的新报名记者，在狱中我和他有一定的交情，曾经也有谈过一些非政治性的生活问题。他为人谨慎，对自己的处境非常忧虑，他的妻子和家人非常关心他，常送好吃的东西到监狱里。他是知识份子出身，曾担任过李光耀秘书长的华文老师，对生活要求较高，与我们这些贫困出身的家庭完全不同。但他为人老实敦厚，谈吐斯文，在狱中除了看书写文之外，甚少参加其它活动，他只和我们相处约半年左右，就被转移到中央警署暗房，单独关押。在被通知转移监狱临走之前，他还特别向我了解中央警署暗房的恐怖经历（我曾在该处关了一个多月），我大略把情况说了一下，他非常无奈而且忧心如焚地离开了章宜监

狱，在两名狱警和一名政治部的便衣人员押领之下，带往那个被喻为鬼狱之地的中央警署拘留暗房。不久，就听说被释放了，从此，我们也再没有见面了。

陈翠嫦同志是 PAP 妇女部主席，也是丹絨巴葛支部最早期的党员之一。据知，她出身于贫穷家庭，受中等教育，但她待人处事斯文有礼，言谈有序，举止大方，颇有涵养，有知识女性的气质。在当时年代，能有这样的女性参政，为数不多，可称她为当时杰出的女活动者，也不为过。

我和她各属不同支部的最早成员，很少有机会在一起交谈，但每次 PAP 举行的群众集会或是中央支部联系会议，她总是跟着李光耀、杜进才、王邦文等一起到会场，我们都有经常见面，在一起的时候都有说有笑，既轻松愉快，又严肃认真。共同事业的牵系，无论是男是女或是素不相识，都不可能有任何陌生之感。

这次广州之见，我已说过，决非偶然相遇，易兄不说，陈不表态，但我心已明白，在互相交谈之中，完全证明我们的推测一点不错。一年多不见，别后如故，但命已有运循之分，我们落难他乡流亡，他们则已贵入官方身份，两者所处位置天渊之别。我们不可能把全部心里的活斗漏出来，唯有向易、陈两位同志表明：希望 PAP 尊重我们的权利，无条件地让我们回到自己的祖国。

易兄答应会尽一切办法把我们的想法向李光耀秘书长转告。在广州他们逗留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到广州火车站乘车往香港，再转机回新加坡。他们住在位于长堤的和平宾馆，说起这间宾馆，还

是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著名星级酒店。当晚，易兄特别留我和才安同在一起住。在房里，别无他人，只作闲聊，谈到 PAP 执政伊始所面对的各种困难，除了继续争取完全独立之外，还要面对来自南北回教国家的威胁和干扰，内部安全不能自主，“公安法令”实施的关键还要看马来亚和英国的脸色，星中两国的建交言之尚早，两国人民的往来或可改变和发展，经贸关系也会改善。但一切的一切，还得看国际形势的发展而定。话中之意，我深感到回国困难重重，但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我严正地向易兄说明：无论如何，我们这批被驱逐出境的反殖人士为 PAP 的执政和李光耀秘书长成为第一届自治政府的总理而感到非常鼓舞和振奋，期盼着能早日实现回新加坡的心愿。

一天一夜的相聚，时间虽短，交谈甚欢，涉及内容范围甚广，大多是共同关心的国事，也有关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对社会主义中国适逢大困难（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所见所闻的新鲜事，更是刺激了易兄的神经，他想从中探讨些神奇的秘密，但我们必竟初到中国不久，这个被西方一直称为“铁幕”的国家，我们对中国的认识，对社会主义的了解，并不比易兄知得更多，有一句老话“班门弄斧，自取其羞。”我们还是做个老实人，不欲言多，易兄也知难而退了。

陈翠嫦同志对此话题并不沉默，在互有保留的内含中，大家并没有任何不同的意见，也没有分歧的见解，只有互相关心、共同理解的真诚共鸣，为短聚长别的惦记，留下深到不灭的印迹。

十几年后，传来一个不幸的噩讯，陈翠嫦同志与世长辞了。这消息来得突然，太令人震惊、难过。不想在广州瞬间之别，即成天地之

永隔。我写了一封信给她的先生——王邦文同志，他是 PAP 总部最早期的受薪组织秘书和党员，当今政府的内阁部长。我向他表示深切的慰问，并赋诗一首，藉以哀思。诗的内容已忘记，情谊却深埋在心里。

续易润堂、陈翠嫦两位同志回星不久，PAP 中央委员陈维忠律师也来到中国，中国外事办公室派来林沙南处长和随员从北京到广州热情接待，我和才安、大英有幸被邀请陪同维忠同志到各地参观，在新加坡，我们只有偶然交谈，并没有太多话说。

在北京相见，就有故交之感，维忠同志感触很深，见闻新奇，无所不谈而表现了十分风趣，对中国这个“巨人”，把自己比作小婴儿出世，认为自己刚刚走向社会什么事都不懂，要从新学走路。陪同他的林沙南处长，是一个文才学识很深的人，对他的谦虚言谈，报以感谢的回敬。我们每到一处，都有当地干部出来迎接招待，足见作为外宾之享受。从这一天起，我已初尝到“外宾”的“特殊待遇”。

陈维忠对 PAP 执政后的形势谈得很少，倒对中国社会的各种新事物感到非常有兴趣，对于我们最关心重回祖国一事，他表现了十分轻松，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大困难，他的态度、表情，令我感到十分鼓舞和充满着希望和信心。

### （十三）蒂凡那代表团访问中国

一九六〇四月三十日国际劳动节前夕，我、才安、文斗还有郭大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兴奋地见到了来自新加坡的朋友蒂凡那同志和他率领的新加坡职工代表团，他们是应邀前来参加国际五·一

劳动节的。蒂凡那是一个稳重和成熟的政治活动家，他经验丰富，处世老道，为人有情有义和知识渊博的杰出人物，他和李光耀、杜进才、方水双、曾超卓等是 PAP 建党发起人之一，他的反殖历史和他的社会活动背景已为他储蓄了雄厚的政治资本。人民热爱他、敬慕他，早已知道他是一个不屈的、在紧急法令下曾坐过牢的反殖英雄。这次率领代表团到中国访问及参加国际五·一劳动节，对我们来说，正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可以畅所欲言，谈论 PAP 执政后的政策路向，李光耀总理对林清祥、方水双和他本人等的工作安排以及各人所持的不同态度。他十分健谈，分析时局非常清晰，对星、马左翼运动存在的旧问题认为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应该彻底改变策略：“团结在 PAP 周围，支持李光耀总理的施政方针。建国之初，百业待兴，反殖斗争要继续，经济建设更急不容缓，左派要自律，不要动輒就反对 PAP 和李光耀，要体谅那些被释放出来的政治领袖在他们被安排的工作岗位上的难处，过于不实际的要求会弄巧成拙，要顾全大局，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希望自己能在这方面尽力而为。

蒂凡那的一席话，概括了他对左翼运动的无限忧虑，对国家发展前途表现了十分忠诚。我们在中国和蒂凡那相见之前已住了一年多，同中国各有关部门领导不时有交换意见。通过思考和自身的经历、体会，我们认识到蒂凡那对时局的分析是正确的。我们深有同感，我们从中国看到：以团结各族和各界人士作为稳定和兴旺国家的基本方针，这是多么正确的强国之道。PAP 执政，李光耀总理初掌大权，党之团结，政之完善，民安社稳，至关重要。我们很赞同蒂凡那的意

见，左翼运动应该调整自己的步伐，在新的不同时期，在新的形势下，在反殖斗争取得一定进展的新阶段，在 PAP 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而取得执政的有利条件下，一切都必须以适应社会的变化而采取相应的配合行动，这才是明智之举，否则将会成为历史的废物。

我的评述，我的态度，也许会被视为是机会主义的暧昧表现，但不要忘记，一步之差的错误后果可能远比被视为“机会主义”所造成的严重损失更加是无法估计的。

和蒂凡那代表团在北京游览各大名胜和相处的几天中，日增的感情使我们有说不完的内心话。在这些日子里，在北京的几位新加坡学运领袖：方小浪、林戴伟、郑美娜等也相续见了蒂凡那代表团，蒂凡那还带领了他的前老师沙尔玛先生和他的家人和我们见面。沙尔玛先生是前马来亚民盟主席，在紧急法令下被捕后被迫离开新加坡前往印度，再转往英国，不久又被中国国务院聘请为中央广播电台英语专家，专职英文翻译工作。我们大家见面，浮现出乡亲旧感情，消除了一切陌生之感，相同的命运，共同的信念，成为我们天长地久的友谊。至今，我和他的太太子女们还经常有联络，每年圣诞节我照样接到他们充满友情的问候和祝福的贺年卡，我也照样寄贺年卡给他和他的家庭。中新建交后，他因长期患有糖尿病，并得新加坡内政部的特许回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国家，但非常不幸，由于糖尿病的并发症回到新加坡，只有短短的时间，就与世永别了。

蒂凡那同志和他的代表团结束了北京之行，在经广州回国之前，他通知了广州职工总会，再由广州职工总会转达广东省华侨事务委员

会负责人，相约在广州生活的新加坡难友到和平宾馆宴会厅叙聚。难友们一听此消息，雀跃赴会。在广州廿几名分散在不同工作单位的难友，无一缺席。这时候，蒂凡那不但是新加坡职工会代表团首席代表，而且是难友们寄予希望回国的“通天使者”。大家欢聚相见，互相拥抱和紧握双手，有倾吐不完的别离思念和患难之交的感情。平时，大家各就各位，很难有机会在这种场合见面，如今，借蒂凡那同志和代表团的光，在中国职工总会的领导人面前，显示出新加坡难友们的战斗友谊和革命激情的感人场面。中国职总的领导赞叹地说：“难得和你们在一起，不愧为马来亚革命的优秀儿女。”蒂凡那同志当即感谢回答说：“我们这些兄弟迟早是要回到自己祖国的。”这句话，激起大家的热烈鼓掌，大家心里明白，也非常相信，蒂凡那兄弟的话是没有半分虚假的，他代表了每一个被驱逐出境者的热望和心声，以他当时的身份，发出对难友们的关怀和鼓励的爱护，再没有比这更宝贵的。

更令人难忘的是从蒂凡那身上看到我国外交人才的出色。宴会刚刚开始，作为主人的中方职总代表照例致词敬酒，免不了说些有利两国政府和人民友好关系的习惯祝词，结尾的内容是：祝中新两国政府的友好关系和发展，祝中新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祝中新两国在各个领域方面的密切合作，祝贵国总理李光耀的身体健康，祝以蒂凡那先生为首的新加坡职工代表团，在座的新加坡朋友们身体健康干杯！话刚结束，蒂凡那同志对主人的祝词觉得不妥，他温和又带友好的口吻向主人表示“抗议”，在场的中方人员和在座的每一个与会者都屏息着静听这紧张时刻的来临。蒂凡那轻轻地举着酒杯客气地说：“请允

许我向主人表示的我的抗议！”话音刚落，大家心里都在跳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蒂凡那是不是思想有问题？疑问还来不及作答，只听蒂凡那向主人的祝词作了补充，高举着酒杯用宏亮的声音说：“我们为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身体健康干杯！”此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高举杯中酒一饮而尽。接着，热烈鼓掌，充满欢乐，更赞叹蒂凡那先生在外交场所上的急智，把主人漏说的而且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十分重要的话作了完善的补充，也许这对当时中方职总负责人有些尴尬，但为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身体健康干杯应该由主人自己来说，蒂凡那的补充也只是幽了主人一默，实际上并无伤大雅。

蒂凡那代表团一行结束了在广州的访问，我、才安、大英和部份难友到广州火车站送别，在离开广州的一刹那，他热情地和我们拥抱，紧紧地握住我们双手，热泪盈眶地用马亚语激动地向我们宣示：“**Kita Mesti Boleh Brejumpa Lagi Di Bawah Matahari Tanah ayer Kita!**”

（我们一定能在祖国的阳光下再见！）话音回旋，飘进心理，感到有像一股暖流遍溢全身。约十分钟，火车缓缓地向前移动，我们依依不舍挥手告别、再见，祝一路平安，祝一路顺风……在祖国的阳光下再见！火车的窗口伸出了代表团亲切的脸孔，手在挥动，脸影渐渐地隐没在视野之中，我们怀着一股说不出的欢乐、惜别和真挚的感情各自离开了火车站，茫然地回到自己的工作单位。

#### （十四）后记

一年之内，从易润堂部长、陈翠嫦议员，到陈维忠律师，又来了



蒂凡那职工会代表团，都是 PAP 中委会和政府的重要成员，毫无疑问，这决不可能是纯属私人感情的探访，那只是一种尝试。一方面，抚慰我们这批被驱逐出境的受难者的心；另一方面，能在当时国内外形势不稳定的大变动中根据政治上的需要为我们的回国作好铺平道路的准备。但无论如何，李光耀总理和 PAP 政府在英殖民者还没完全退出其势力和影响的严重时刻，能有这种勇气，通过党内的老战友到中国了解情况和试探我们回国的态度和意向，对我们作出必要的关心，那是一种非常明智的策略。至今我们仍没有忘记那时候留下的深刻的一幕。

离开新加坡国又有半个世纪了，在中国以一个新加坡人的身份住了满满十年。在那段时间里，我不断地关心和注视着新加坡社会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手上握有一些资料。但这些资料，也只是从报纸，各种政治刊物、电台的广播得知的，离真实的社会环境截然不同。

不能否认，资料是书写回忆素材的重要消息和提供参与思考的来源。我在港澳居住了 36 年，由于忙于生活，忙于商务，忙于创造一个能有立足之地的条件，我很少有时间去关心自己国家（新加坡）的事。所以手上很缺乏这方面的资料。

要写早年的政治历史，斗争年代，只能去图书馆翻阅旧书，寻找资料，这方面，我完全没有条件。只有靠朋友赠送的大作，PAP 周年纪念的特刊，还有一些个别文章，有关内容，只值参考，但甚少涉及到事件的真实性，泛泛而谈，予人感觉：真理，正义的呼声何在？

不平则鸣，讲出真话，鸣出声音，有人性者，岂不共呼！

世界很大，交通发达，通讯先进，变得很小，人们可以在万里相隔的遥远地方，把自己的尊容和声音送到你的面前。更何况长期以来，耳闻目睹的事太多了，亲身经历的社会变化使人的思门被打开了。看到人的真实面孔，鬼的丑恶心灵，哪怕早已离开了过去表演过的政治舞台，出出好戏也一晃而逝，但戏的精神内容，戏的表演功架，戏的动人场面，戏的人物形象，留下的是一幕幕的图景还有深刻难忘的记忆。

要把这些记忆通过有系统的文字整理出来，对一个不具文化深度的普通人来说，简直就是徒劳。但为事件本身的价值，硬着头皮也要作出尝试，粗劣不关紧要，丑妇也得见家翁。能为过去的往事留下一点印迹，哪怕是微乎其微或是不足言道的小事，也不失为是好事一桩。基于这个理由，自己还有什么苛求。愧而言之，那些熟悉此段历史经过的老朋友、新朋友，还有关心此段历史的每一个人，对所写的内容或是观点的错误和不实之词，应予以批评和指教，也希望能予以披露和揭穿。

这不是书，不是历史，只是历史的补充记忆。但愿有更多类似的好朋友，也能利用自己休闲的时候，汇集各种记忆的补充，为新加坡国家的真实历史留下可贵的遗产。

新加坡从建国到成为亚洲“四条小龙”之一的发达国家，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对那些持不同政见的老战友并没作出关心、体恤和抚慰的表示，可以为 PAP 树立一个宽容、大度、仁义、不念旧疾的崇高形象，这是我为之所叹息的。

我曾听到受尽人民爱戴的老朋友说过，一个事业的成功，是用无数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更多的人是付出他们一生的幸福或承受着悲惨的遭遇献出他们的宝贵青春。只要他们不是敌人或是一个破坏者，相反的，他曾为这个事业的成功作出牺牲和贡献的人，也许他有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甚至是不可原谅的错误，我们也要给予应有的，客观的对待和评价。老朋友的话，充份地体现出他的高尚、宽容、善良、仁义、忠诚的政治品德。我是完全同意他的观点。

千秋功业，在执政者的权力范围内，在 PAP 第二代领导人实施新政的潮流下，能决于一夕之思、一举之动、一动而定地宣布此一仁政，必引世界之好评，国人之欢呼，民望之高涨，政体之坚固，是值得的为政者三思。

半个世纪以来，每想往事，有无限的感慨和叹息，在自己生命的旅程中，奉献和付出，不求回报，不计得失，问心无愧，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这就是生命的价值，我们复有何求？看到我国社会的不断进步，祖国人民生活得富裕，国家安定，经济发展，科技千里飞跃，建设万里光辉，我们心愿已了，何需悔怨？